

蒋伯潜 / 朱剑芒 著

要纂学经 要学经



经学纂要

经学提要



著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黄保定
封面设计 许康铭

经 学 纂 要
经 学 提 要

蒋伯潜 朱剑芒著

岳麓书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200,000 印张: 8.375 印数: 1—9,300

ISBN 7-80520-230-3

G·26 定价: 3.50元

〔湘岳 90—10—1〕

出版说明

这是两种先后在四十年代问世、用以普及文化典籍知识的通俗读物。虽然都是介绍我国经籍中最重要的丛书——十三经，但由于两位编著者在学术上的见解不一，故阐释的重点不尽相同，对文献资料的取舍也不完全一致，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故特将二书合二为一，整理出版，以利读者开阔视野。

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明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渊源，便不能不知道“经籍”和“经学”的大概。因为，‘经’是我国文化典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旧中国地位最高、权威最大的古书。但是，我国为什么有一部分古书要特别称做“经”呢？历代帝王为什么要尊孔读经呢？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皓首穷经’呢？‘经’与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延续，与我国古代哲理、文学、史料、风俗、制度等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应抱什么态度去看待那些经书呢？……等等。对这样一些问题，至今仍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读者并不了解。然而，我们每个人又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传统，只有如此，才能清楚地认识历史、现在与未来。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既要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读书热情，又要编印出版一批通俗阐释文化典籍的出版物，为读者指点读书门径。有鉴于此，我们特地重印《经学纂要》（蒋伯潜著）和《经学提要》（朱剑芒著）两书，以飨读者。它们是一种兼具知识性、资料性、学术性的普及读物，不仅简明扼要地介绍《周易》、《尚书》等十三经的内容和撰述人，而且各有见解地阐述了“经学”

的发展源流，论述了今天应怎样看待这些古代典籍以及怎样去读它们。我们相信广大读者通过学习和了解古代典籍，从而增长知识、启迪思想，激发爱国热情。

此次重印，分别采用建国前原正中书局和世界书局版本，并纠正了原书在排印中的一些错字。为了节省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在整理这两种旧书时，对部分章节中的雷同之处，进行了适当删节。特此说明。

编 者

1990.7月

目 录

经学纂要

绪言	(1)
第一章 十三经解题	(15)
第二章 十三经撰述人(上)	(14)
第三章 十三经撰述人(下)	(26)
第四章 十三经的今古文	(36)
第五章 周易述要	(46)
第六章 尚书述要	(58)
第七章 毛诗述要	(70)
第八章 周礼、仪礼述要	(82)
第九章 礼记述要(附:孝经、尔雅)	(95)
第十章 春秋经传述要	(106)
第十一章 论语述要	(118)
第十二章 孟子述要	(130)
第十三章 经学史鸟瞰	(140)
第十四章 经今古文学	(152)
附录:十三经注本举要	(165)

经学提要

第一章 总论	(177)
--------	-------

一、经学·····	(177)
二、经籍·····	(178)
三、解释经义之书籍·····	(180)
四、读经之程序·····	(181)
第二章 易经 ·····	(183)
一、易之定义·····	(183)
二、三易·····	(184)
三、易之内容·····	(185)
四、易之师传·····	(196)
第三章 书经 ·····	(198)
一、书之要旨·····	(198)
二、书之体例·····	(199)
三、今文、古文之区别·····	(203)
四、书之师传·····	(205)
第四章 诗经 ·····	(208)
一、诗之要旨·····	(208)
二、孔子删诗之大概·····	(209)
三、诗之六义·····	(211)
四、诗之师传·····	(217)
第五章 礼经 ·····	(219)
一、三礼·····	(219)
二、周礼之内容·····	(220)
三、仪礼之内容·····	(223)
四、礼记之内容·····	(225)
五、礼之师传·····	(227)
第六章 春秋 ·····	(229)

一、春秋之定义·····	(229)
二、春秋之要旨·····	(230)
三、春秋之体例·····	(231)
四、春秋之内容·····	(233)
五、春秋三传·····	(234)
六、春秋三传之师授·····	(236)
第七章 论语 ·····	(238)
一、论语之要旨·····	(238)
二、论语之内容·····	(239)
三、三论·····	(242)
第八章 孟子 ·····	(243)
一、孟子之要旨·····	(243)
二、孟子之内容·····	(246)
三、孟子政治学说之重心·····	(249)
第九章 尔雅 ·····	(251)
一、尔雅之性质·····	(251)
二、尔雅之内容·····	(252)
第十章 孝经 ·····	(254)
一、孝经之要旨·····	(254)
二、孝经之内容·····	(255)
三、孝经今古文之源流·····	(256)

绪 言

我们要了解我国固有的文化，明了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渊源，便不得不知道所谓“经”的大要。我国自有目录之学以来，分别图书部类的，都把“经”特列为一部门，如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郑默《中经》，荀勗《新簿》的‘甲部’，王俭《七志》的《经典志》，阮孝绪《七录》的《经典录》，《隋书·经籍志》，以至《四库全书》的经部，都是专门著录“经”类书籍的。因为，从汉到清，所谓“经”者，已成为我国地位最高、权威最大的古书了。专制帝王的提倡，利禄的引诱，固然是前人“尊经”的一种重大原因，但是“经”的本身，如果毫无价值，则帝王虽欲利用之以笼络人心，数千年来的学者也有许多淡泊明志、富贵不能淫的，为什么尽毕生的心力来研究经学呢？“经”之中，有古代的哲理、文学、史料、以及制度、风俗……，我们可以由此寻得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泉，借以了解固有文化之最重要的部分。所以现在虽不必象科举时代那样去死读经书，以博科名，但对“经”和“经学”，却不能不知道它们的大概。

为什么这一部分的古书，特别称做“经”呢？《释名·释典艺》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孝经序疏》引皇侃曰：“经者常也，法也”。《玉海》四十一引郑玄《孝经注》

曰：“经者，不易之称”。这些解说，都是汉以后尊经者之谈。他们以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经是垂教万世、永远不变的常道，所以有此解说。《论语集解·序》有“六经之策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的话；这和现代书籍版本各有大小一样。因此，有人以为“经”是官书，所以竹简特大，故称为“经”。竹简大小，古代或有定制，诚未可知；但是这些竹简特大的官书，何以特名曰“经”，则又难索解了。且《国语·吴语》“挟经乘桴”之“经”，则指兵书；《内经》、《难经》，则为医书；荀子尝引《道经》；贾谊《新书》又有《容经》；这些“经”，既非官书，亦非圣人所作，万无不变的常道。所以上述二说，似都不能成为通解。近人章炳麟尝说，“经”为以丝编缀竹简成册之通称，犹印度佛书称“修多罗”，翻译梵文者，也都译作“经”，颇为得之。如章氏之说，则“经”字本为泛指书册的名称；其后以尊经之故，方成为一特殊的名称的。

《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六经”之名，见于古书中者，似以此为最早。大概庄子时已有所谓“六经”了。《礼记·经解篇》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虽然所说的是《诗》、《书》、《乐》、《易》、《礼》、《春秋》之教，并未径称此六书为“经”，而并举六书，且以《经解》名篇，可见那时必已以此六书为“六经”。可是这篇《经解》究是何时何人所作，已不可考了。汉人则称“六经”曰“六艺”，故《七略》著录经类书籍者，曰《六艺略》。贾谊《新书·六术篇》曰：“《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称六经为六艺，似以此为最早。至于《周礼》保氏“以六艺教国子”的“六艺”，则系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者而言，并非指六经的。

《庄子·天下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义”。这虽是极简单的几句话，颇能说明六经之用。《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之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和《天下篇》所说，大同小异。《自序》又曰：“易著天地阴阳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义，《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这一段文章，不过在前面加以说明，意义却和《滑稽列传》所引孔子之言相同。《汉书·艺文志》曰：“《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而《易》为之原。”班固以六经配五常，故其论六经之用，与《庄子》《史记》不同。

西汉初世，诸儒传经，溯其渊源，出于《荀子》。更上溯之，则出于孔子之门。《汉志》也有“儒者游文于六艺之中”的话。因此后来学者都以“六经”专属儒家。六经所以都出于孔子者，实因古代学在王宫，私人无著述，私人不讲学；开私人著述讲学之风的是孔子。孔子对于六经，有一番整理改造之功，且用以教人。故不但六经出于孔子，开诸子风气之先的也是孔子（《老子》一书，疑系战国时人作）。《庄子》是道家之书，而《天下篇》评述当时学术的渊源派别，首段总论“道术”，先言六经之用（引见上文），所谓“鲁、邹之士，搢绅先生”，即指孔子；后论“道术”裂为“方术”，始并举墨、法、名、道德诸家巨子。可见六经是古代“道术”的总汇，孔子是诸子蜂起的先声。孔子固然是儒家一派的开山祖，‘六经’固

然是孔门的宝典，但必以儒家局限之，似乎范围是太狭窄了。

后世“经部”之书，不但六经，“经”之外，又有所谓“传”者。如《易》，汉人常称《系辞》等为《易大传》，盖以《卦辞》《爻辞》为《易》之“经”，《十翼》为《易》之“传”；《春秋》为“经”，《左氏》、《公羊》、《谷梁》为《春秋》之“传”。《博物志》曰：“圣人所作曰‘经’，贤者所述曰‘传’”。《左传疏》曰：“传者，传也，博释经意，传示后人”。《礼记·曲礼疏》曰：“传，谓传述经义。或亲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故谓之传”。所以“传”是用以释“经”的，其地位当次于“经”一等。又有叫做“记”的，如《礼》有《礼记》，《乐》有《乐记》（《汉志》《乐》类有《乐记》二十三篇；今《礼记》中之《乐记篇》，即采《乐记》之一部分并合而成），其地位亦略等于“传”。六经之外，加以“传”“记”，于是“经”类的书籍便渐渐地多起来了。直到近代，方编成一部大丛书，叫做“十三经”。

研究本经及传记的学术，就是所谓“经学”。经学盛于西汉中世。至西汉末，发现所谓“古文经”，与当时博士们所诵习的“今文经”不同，或文字歧异，或脱字，或脱简，或篇数加多，甚至有并无今文本的古文经；而古文经学家于六经的秩序意义，孔子的地位，古代的制度……，也主张不同。于是从西汉末以至东汉，“今文”“古文”两派遂成分争的局面。直到东汉末，“今文”、“古文”，方又混合。而三国、六朝、唐、宋、元、明，经学呈长期中衰之象，至清代始能勃兴。清代中叶以后，“今文”派又重新抬起头来，“古文”“今文”乃复分为两派，直到民国初年。我们要追述经学的历史，今、古文的分合，是必须注意的问题。

本书先就“十三经”作简明的述说，再由西汉直至现代，略述经学的历史，旨在使读者从本书中获得所谓“经学”的常识。至于对经学作专门的研究，则有待读者自己去下工夫了。

第一章 十三经解题

我国古书中所谓“经者”，既指“六经”而言，为什么现在又有这部“十三经”呢？“十三经”，可以说是重要的经传的丛书。这部丛书是到宋代方完成的。六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本书《绪言》中已述及之。六经中的《乐》，实际上是没有这部经的。所以《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六经，“《乐》”类第一部就是《乐记》。为什么没有《乐经》的呢？古文经学家认为《乐经》遭秦始皇焚书之祸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乐本无经”。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烧光，即如古文经学家所说，《易》以卜筮之书不焚，《诗》以讽诵不独在竹帛得全，《书》、《礼》、《春秋》，在西汉之世，也陆续发现。《乐》如有经，对于政治又没有什么重要关系，何以独完全亡失，不再发现呢？所以《乐经》亡于秦火的话，不能使我们相信。乐本无经者，因为它只是《诗经》的乐谱，《诗经》中的诗便是它的歌辞，二者本是相附而行，和现在画着五线谱的诗歌集一样的。故论其性质，则《乐》自《乐》，《诗》自《诗》，验之书籍，则《乐》与《诗》是合在一起的。乐谱不是文字，故不能独成一经。《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论语》记孔子之言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孔子曾就《诗》三百五篇的乐谱，加以整理，使皆合乐可歌了。

到了西汉，传《诗》的经师，专致力于《诗经》的文字训诂方面。

当时的音乐家，如制氏之类，又只能记铿锵鼓舞之节，而不能言其义，于是《乐》和《诗》便脱离关系。东汉末，曹操平荆州，得汉雅乐郎杜夔于刘表处，夔年老，不能记忆，仅《驹虞》、《伐檀》、《鹿鸣》、《文王》可歌。可见《诗》的乐谱到这时尚存四篇。不过西汉经师研究经书，对于这部没有文字的《乐经》都不注意，所以无人传授。“六经”中除了《乐经》，便只有“五经”了（汉武帝时有‘五经博士’）。

“五经”之外，又有所谓“七经”。但何为“七经”，其说有四：（一）六经之外，加《论语》为“七经”，见唐李贤《后汉书注》；（二）宋刘敞的《七经小传》以《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为“七经”；（三）清圣祖康熙《御纂七经》是《易》、《诗》、《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四）日本人山井鼎《七经考文》是《易》、《诗》、《书》、《左传》、《礼记》、《论语》、《孝经》。可见所谓“七经”，并不是公认的一种丛书。唐代以《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易》为“九经”。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则《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书，换成《春秋》、《论语》、《孝经》，仍为“九经”。而文宗所刻的《开成石经》则《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之外，又加了一部《尔雅》，已成为“十二经”了。《孟子》在《汉书·艺文志》本列入《诸子略》儒家中，可见它在汉文帝时虽曾立博士，西汉学者虽把它看作经书中的“传”，尚未正式列入经类。宋代理学家提倡《孟子》，朱子定《论语》、《孟子》及《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为《四书》，明清科举定为令甲，于是《孟子》的地位骤高。但五代时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经，不列《孝经》《尔雅》而加入《孟子》，《孟子》已列于“经”了。及清高宗刻十三经于太学，于是“十三经”这部丛书，乃成定本。兹先就其书名，分

别加以解释。

(一)《易》——郑玄的《易赞·易论》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谓郑玄之说出于《易纬》。按《易纬·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这就是郑玄所本。《易繁辞》说：“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其《易》之门邪！又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坤’确然示人简矣”。“乾”“坤”二卦，既是《易》之缊、《易》之门，而乾之德“易”，《坤》之德“简”，所以说《易》有“易简”之义。《系辞》又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雷霆、风雨、日月、寒暑，是自然界的變化，而《易》象之。《易》之为书，无非讲的是天道人事的变化，故又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非天下之至变，孰能与于此？”“《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所以说《易》有“变易”之义。

《系辞》又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古人认为天在上，地在下，是自然界不易的定位；虽然自然界的现象有静有动，自然物的性质有刚有柔，而其动静刚柔也各有不变的定则；这就是所谓“不易”，也就是《易》的含义之一。如此看来，则《易》含三义，《系辞》中原有此意，并不始于《易纬》。《乾凿度》所说“易者，其德也”，“变易者，其气也”，“不易者，其位也”，以“德”说“易简”，以“气”说“变易”，以位说“不易”，也是取《系辞》之说而小变之。

其实，古人认为《易》以六十四卦包括宇宙间一切天人的现象，以简驭繁，这是“易简”，占卜时以卦爻变化示人吉凶，每次各有不同的卦象爻象，这是“变易”；他们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易》理是万世不变的，这是“不易”。我以为《易》的三义，不如这般说法，例比旧解明白。虞翻的《虞氏易》又有“日月为易”之说，盖出于道家的《参同契》。《说文》“易”字下引“秘书说”道：“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易》是讲阴阳的书，“易”字以日月代表阴阳，似亦近理；可惜“易”字不是“日”“月”二字合成的。《易》又名《周易》。郑玄《易赞·易论》说：“《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包”。是以“周”为“周普”之义。孔颖达《周易正义》引《易纬》曰：“因代以题周”，以为文王演《易》时正拘羑里，彼时尚是殷代，故题“周”以别于殷。那末，《周易》的“周”字，又是代名了。

(二)《书》——“书”，本是一切书籍的通名。六经中之《书》又名《尚书》。秦以前，经子诸书引《尚书》之文，都仅称“《书》曰”，不称“《尚书》”。疑《尚书》一名起于西汉。因为《尚书》各篇，最早的是《尧典》，最迟的是《秦誓》。西汉初世，去春秋秦缪公时已远，故名此书曰《尚书》。孔颖达《尚书正义》说：“尚者上也，言此为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说：“以其上古之书，故曰《尚书》”。这是《尚书》名称的正解。此外又有二说，皆见于《经典释文叙录》自注中。一是郑玄说：“孔子撰《书》，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盖言若天书然”。按《汉书·艺文志》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出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

《尚书》曾经孔子编撰，固为先儒所公认；但说它经孔子撰定，若天书然，所以名曰《尚书》，则《易》、《礼》、《春秋》，也当加一“尚”字了。二是王肃说：“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按

《汉书·艺文志》又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王说本此。但《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正与《汉志》所说相反。且左右二史记言记动，势难划分得这样清楚。《尚书》中，如《顾命》所记，大部分为丧礼仪式，《禹贡》所记，全篇为九州山川赋贡，并不能说它是完全的记言之史。所以后二说都不如前一说的妥当明白。

(三)《诗》——《诗》为我国最古之诗歌总集。故名曰“诗”。这是不必加以解释的。可是现在‘十三经’中这部《诗经》，又名《毛诗》，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部《诗》是毛公所传。毛公有二：一是大毛公，鲁人，名亨；一是小毛公，名萇，赵人。毛公所传之《诗》叫做《毛诗》，和燕人韩婴所传的《诗》叫做《韩诗》一样。《韩诗》只存外传了。‘十三经’中之《诗》，是二毛公所传，所以又有《毛诗》之称。

(四)《周礼》——‘十三经’中，关于‘礼’者有三：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叫做“三礼”。《汉书·艺文志》礼类有《周官经》。班固自注说：“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荀悦《汉纪》说：“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经典释文叙录》说：“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汉书·郊祀志》记王莽改南北郊祭祀事，犹称“《周官》”；《王莽传》记莽徵天下通艺，及张纯等奏，亦称“《周官》”；此二事都尚在王莽未居摄时。《食货志》中，此书名凡二种：载莽诏，则曰：“夫《周礼》有賒贷…”。其后叙事，则曰：“又以《周官》税民…”。据此，可见《周官》改名《周礼》，完全是刘歆的主张，王莽所采行。故《汉书》载王莽之诏则称《周礼》，餘则仍曰《周官》。郑玄《周礼注·自序》已称《周礼》，而《后汉书·儒林传》仍称玄作《周官注》，又称马融作《周官传》，但